卫方济经典译介视域下的中国哲学西传研究

蔡新宇*，莫玉梅

青岛理工大学　山东青岛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耶稣会士卫方济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关键角色，尤其是在中国礼仪争议背景下对儒家典籍的翻译实践。尽管当时罗马教廷已发布禁止中国礼仪的法令，卫方济仍坚持通过译介工作构建其对中国思想体系的理解。他综合经典原文、儒家注疏以及各类文化背景的观点，逐步形成一套以伦理为核心的礼仪诠释系统，并最终促成他所理解的“中国哲学”的雏形。本文以 1711 年其在布拉格出版的《中华帝国六经》为核心材料，通过对《中庸》和《孝经》译文的分析，揭示其翻译方式、文化意图及跨文化适应策略，评估其对欧洲启蒙运动与思想变革的潜在影响。卫方济的翻译活动不仅推动了儒家思想在欧洲的传播，也为后世研究中西文明对话提供了宝贵视角。

【关键词】卫方济；经典翻译；跨文化互动；《中庸》；《孝经》

【收稿日期】2025 年 7 月 16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8 月 18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21

Chinese Philosophy’s Transmission to the West through Francois Noël’s Classical Translations

Xinyu Cai, Yumei Mo*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Abstract**】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key role played by the Jesuit missionary François Noël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particularly in his translation practices of Confucian classics amidst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Despite the papal decree that had banned Chinese rites, Noël persisted in construct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system through his translation work. He synthesized the original texts of the classics, Confucian commentaries, and perspectives from various cultural backgrounds, gradually forming a system of rites interpretation centered on ethics, which ultimately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his vers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is 1711 publication *Six Classic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Prague, analyzing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nd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to reveal his translation methods, cultural intentions,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It evaluate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his work on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and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Noël’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not only facilitated the spread of Confucian thought in Europe but also provided a valuable perspective for future studies on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Keywords**】Francois Noël; Classical translation;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Doctrine of the Mean*;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在“中学西传”的历史进程中，儒家典籍的海外译介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四书”的传入对西方思想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现有文献中，学者普遍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卫方济对儒学经典的翻译与注释。叶格正与韩振业等学者，尝试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探讨卫方济如何借用西方逻辑工具解析儒家观念，从而在理论层面实现文化的双向建构。除此之外，肖清和与李竹磬的研究则转向了礼仪之争时期卫方济的发声立场，强调其在复杂文化对抗背景中的身份认同及“代表中国”的话语方式。该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卫方济在全球宗教与文化权力博弈中所扮演的中介者角色。赵娟与叶格正的合著尝试结合亚里士多德式哲思，分析卫方济译作中的文化解释路径，突显其对《四书》文本进行合理重构与理论再释的能力。邱楚、韩振华则从《孟子》在西方的早期传播入手，进一步厘清了其译介网络及学术传播轨迹，对卫方济在西方思想启蒙初期的推

*通讯作者：蔡新宇（2000-）女，汉族，安徽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史。

动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张艳所作研究着眼于清初中外交流背景下汉学家的文化实践，她指出卫方济的多重身份让他在中西知识系统之间展现出高度的转换能力。罗莹则借助其作为耶稣会士的宗教背景，探讨其翻译活动如何兼具神学意图与文化传播功能，拓宽了我们对宗教与知识传播之间关系的理解。

总体而言，现有学术成果对卫方济翻译实践的文化价值已有深入论述。然而，尚有不足之处在于缺乏对其翻译文本本身语言策略的系统分析，尤其是在文本结构、术语选择及文化嵌入方式上的微观研究。本文试图从语际转换与文化适应角度出发，全面评估其译介儒学典籍的学术贡献及其在中西思想交流史中的历史定位。

1 卫方济生平

卫方济（Francois Noël）于 1651 年出生在今比利时境内的埃诺省埃斯特吕地区。19 岁时，他加入了耶稣会高卢-比利时会省，并在图尔奈的初学院接受宗教训练与人文学科教育。在修道初期，他不仅深入研读神学，也长期教授文学、修辞等课程，为其后来的文化翻译打下了扎实基础。1684 年，他与另一位传教士 Philippe Selosse 从里斯本出发，原计划前往日本开展布道[1]，但在航程中 Selosse 不幸病逝，卫方济则于 1685 年成功登陆澳门。此后，他两度尝试进入日本传教，皆因形势所限未果，最终被安排留在中国江西省南昌，成为当地传教士。1701 年，卫方济受命与庞嘉宾一道赴罗马，代表耶稣会就中国礼仪争议向教宗陈情。在此次任务中，他们试图为中国传统礼节辩护，希望教廷重新考虑之前的禁令，但未能如愿。1707 年他返回澳门，旋即再度出任“代理人”，于 1708 年与康熙特使艾逊爵、陆若瑟及随员樊守义等人启程前往罗马。1709 年，他们在罗马汇报了中国的传教事务，提交多份报告[2]。卫方济认为这些材料将有助于教宗了解耶稣会的真实立场。然而，教廷的最终决定仍未偏向耶稣会。之后，卫方济前往布拉格，在耶稣会公学中开展学术工作，并于 1711 年前后完成多部重要儒学译著。

此后他辗转前往法国，曾两度申请返回中国，皆被拒绝。1716 年又至里斯本请求重返东方传教，但依旧无果。最终，他于 1729 年在法国里尔安然辞世，结束其一生的文化与信仰旅程。

2 《中国六经》：翻译与文化重构

1711 年，卫方济在布拉格正式出版了他最具代表性的汉学译著——《中华帝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这是继 1687 年柏应理翻译“四书”之后，耶稣会士在中国儒学系统翻译上的又一里程碑[6]。该译本涵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六种儒家经典，具备完整结构、系统评注与详实引文。译文采用拉丁文形式，每段经文与原文一一对应，附编号与注释，译者常在段前或段后补充解释，力图使西方读者准确理解文本精神[3]。值得一提的是，卫方济并未仅依赖朱熹《四书集注》，而是融入其他注释传统及其个人理解，体现出译者的主体性判断。《大学》被他译为“成人之学”（Adultorum schola），而《小学》则为“幼童之学”（Parvulorum schola）。此种分类反映出他对儒家教育分层体系的精准把握，也暗示其在伦理教育上的重视。他对这些书籍的选择，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向西方展示中国礼仪体系的道德根基，从而缓解教廷对“偶像崇拜”的误解[4]。1780 年代，《中国六经》被翻译成法文出版，并新增了 Pluquet 撰写的哲学说明文章，探讨中国伦理与政治思想的起源与结构。这一转译行为进一步推动儒学在法国启蒙时期的传播与思辨。从目前存世手稿与文献看，卫方济在南昌期间已完成《论语》《孟子》《中庸》等主要文本的翻译，显示其译事并非始于欧洲，而多发生于实地传教过程中[5]。这种“在地翻译”体现了其对文化语境与思想原生性的高度重视。据孟德卫考证，卫方济强调中国童生必须熟读《小学》《大学》等教材，方能参加科举，取得功名[6]。因此，他认为这些基础读物更能代表儒学入门结构，也更适合用来介绍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他未选择翻译五经，是因其内容较为晦深，且非一般士人所熟练背诵的文本。此外，《中国六经》也被视作承继罗明坚、利玛窦、柏应理等人儒学译介传统的集大成之作，其译法也成为耶稣会学习文言文的重要教材。他对《孟子》的高度推崇，尤其是对其中所体现的忠义、仁政、道德修养等内容的认同，也显示其希望借助伦理价值建立中西文化共识[7]。

3 《孝经》翻译的文化意图与策略

《孝经》首次以西方文字形式呈现是在 1711 年，由卫方济收入其代表性译本《中国六经》之中，拉丁书名为 Filialis Observantia，并辅以音译“Hiao Kim”[8]。在翻译体系的安排上，卫方济遵循了中国儒家由文字训诂入理学义理的传统方式，逐步展开字义、文义与哲理三重层面的阐释。

他将《孝经》与《四书》《小学》并列呈现，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儒家伦理教育体系，目的不仅在于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家庭道德理念，更重要的是为中国的“祭祖礼”辩护。在当时中西文化交锋频繁的局势下，“祖

先崇拜”被部分西方神职人员误解为异教偶像崇拜，而卫方济试图借助《孝经》论证其为家族伦理延续与社会秩序维系的核心要素[9]。

在译文中，他大量采纳康熙皇帝对于相关术语的解释，强调中国人所敬奉的是祖先而非神祇，属伦理实践范畴，并非宗教膜拜。他进而指出，如若教廷强行禁止中国祭祖传统，可能严重削弱本地人对基督信仰的认同与接纳度，甚至妨碍传教事业的发展。

此外，卫方济还强调《孝经》是中国士子在科举制度下必须掌握的经典，与《小学》《大学》等共同构成士人道德教育的核心教材[10]。相比《诗经》《尚书》等内容复杂难解的“五经”，这些易读、常背的书目更具代表性，更能有效传达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逻辑。值得注意的是，在《孝经》多处引述《诗经》内容的段落中，中文原文往往未标明出处，而卫方济在拉丁译文中详细标注每条引用所出篇章，其所依据的资料与吕维棋的《孝经大全》高度吻合[11]。此举不仅显示出他对文本细节的敏感，也体现了其致力于提升译文学术性的严谨态度。

4 《中庸》翻译的语言风格与哲学倾向

在对《中庸》的翻译过程中，卫方济展现了其深厚的哲学素养和语言转换能力。该书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一句，历来解读纷歧。卫方济在翻译时采取了相对中性的处理方式，将“天命”解释为“上天所赋予的内在本质”，并将“道”视为“顺应此本质的行为路径”，而“教”则为“规范此路径的制度安排”[12]。这种翻译策略保留了儒家天道观的哲学内核，同时避免使用过于神学化的术语，与前辈艾儒略将“道”解释为“自然律”甚至“基督法则”的方式形成对比。卫方济的表述更具理性气息，有意降低基督教色彩，以便西方学者从伦理哲学角度理解儒家思想。

在词汇处理方面，他秉持一词一义的翻译原则。例如，“道”通常固定译为 via（道路），在不同语境中延伸为“正当行为之路”（recta agendi via）、“中庸的恒道”（immutabilis Medii via）、或“理性的道路”（via, sive recta ratio）等。对于“天”、“君子”、“鬼神”等核心概念，亦分别使用 coelum（天）、vir sapiens（智者）、spiritus（灵体）等稳定词汇。

尤为重要的是，卫方济在注解中积极引入朱熹与张居正的解释，如在翻译张居正关于“天性”与“理”关系的评注时，指出“上天造人时赋予气以成形、赋理以成性”，并由此引申“道”乃人生行为的基本规范[13]。当面对“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类涉及人与“天”互动的语句时，他选择翻译为“若未得所愿，不应向上天怀怨”，从语义上突出了理性克制与伦理自律的含义；而“故大德者必受命”则被他理解为“至德之人必由天而得其治权”，这一说法在表层维持儒家话语，深层则隐含对王权合法性的普世理解，接近《圣经》中“君权神授”的理念[14]。由此可见，卫方济在翻译《中庸》时，始终在儒家经学与基督教神学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他既不刻意宗教化儒家典籍，也不全然排斥其中神圣意识的存在，而是力图将其转化为具有理性结构的伦理学体系，使其为西方读者所接受与理解[15]。

5 结语

耶稣会士在中国长期驻留所形成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对其思想行为有深刻影响。卫方济便是这一群体中的典型代表——他既是神职人员，也是一位学者型汉学家。在其翻译与写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如何在信仰与理性之间游走，将神学身份与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有机融合。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所有外来文化在传入过程中，势必会遭遇原有本位文化的解释过滤。卫方济通过其译本展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重新编码，他不仅转化了经典内容，更赋予其在西方知识系统中可理解的结构与语义。他的译作虽有部分混合了评注与原文，但在 17 世纪这一阶段，这种“注入理解”的译法正是适应文化转译需求的一种策略，旨在让西方学者能够真正进入中国思想世界。更进一步地看，卫方济将文本、注解与个人解释三者融合，实际上是在构建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中介话语”。通过此种话语，他成功地将儒家学者的世界观引入西方文明的思想空间之中，为欧洲启蒙思想体系注入了来自东方的理性与伦理资源。从文化哲学角度讲，卫方济的工作证明：宗教并非唯一的价值规范来源，儒家传统中也存在着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道德哲学。他在其译文中反复强调“理性”“德行”“道义”等核心概念，其实已经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种除基督教外的思想参照。这一点对 19 世纪浪漫主义与古典人文主义的发展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卫方济不仅是一位传教士，更是一位具备跨文化能力的思想桥梁。他将中国古代经典以全新方式译入欧洲语境，推进了跨文化认知、伦理体系与知识秩序的交流。其贡献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尤显珍贵，也为我们今天重新思考文化互译与文明互鉴提供了有力范例。

参考文献

[1]　陈恩维,廖燕. 16—18 世纪中华典籍外译研究的回顾与

展望[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5(4): 51-58.

[2] 韩振华. 夫子徂西初记——《孟子》在西方的早期接受(1593—1754)[J]. 国际汉学, 2014, (2): 159-175.

[3] 黄正谦. 论耶稣会士卫方济的拉丁文《孟子》翻译[J].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2013, (57): 133-172.

[4] BROCKEY, L. M.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 江晓梅. 《中庸》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0: 154.

[6] 李想. 《孝经》义理的教育学阐释[J]. 教育学报, 2023, 19(4): 186-195.

[7] 卢志强. 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J]. 美术, 2018, (12): 36.

[8] 罗莹. 清朝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及其儒学译述研究[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5, (01): 120-128.

[9] STANDAERT, Nicolas. The Intercultural Weaving of Historical Texts: Chinese and European Stories about Emperor Ku and His Concubines[M]. Leiden, Boston: Brill, 2016.

[10] NOEL, Francois. 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M]. Pragae: [s.n.], 1711.

[11] 罗莹.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概念的译介——以“天”的翻译为例[J].学术研究,2012,(11):26-31+159.

[12] 吕世生.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2(03): 62-71.

[13] 张艳. 清初汉学家卫方济与中西文化交流[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9(11): 97-99.

[14] 赵静. 晚清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J].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17, 34(1): 62-67.

[15] ARISTOTLE. L’ethique à Nicomaque[M]. Edited by René Antoine Gauthier. Tome I. Louvain-La-Neuve: Peeters Publishers, 2002.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